

中国文化研究

(上卷)

30年

邵汉明 主编

陈一虹 宋立民

刘辉

王永平

副主编



中国文化研究

30年

上卷
中国化学派研究

邵汉明 主编

陈一虹 宋立民 刘 辉 王永平 副主编

G12/64
:1
2009

人民出版社

吉林省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
项目编号：吉教科文合字 2008 第 11 号

顾 问

张岱年 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方克立 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孙乃民 原吉林省社会科学院院长、研究员

编 委 会

主 任 邴 正

副主任 邵汉明

编 委 (按姓氏笔画)

方国根	王 雅	王艳坤	王永平
孙鹤鹃	连 瑶	刘 辉	宋立民
邱高兴	陈一虹	陈玉梅	金中祥
荆 雨	崔永东	萧 平	慈 彪
漆 思	黎 韵		



出版说明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步入了大发展时期，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文化建设也出现了空前繁荣的新局面。回顾、总结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文化研究和讨论的基本情况，厘清文化论争的基本脉络，指出各种观点的长短得失，进而提出未来中国文化发展的前瞻性、建设性意见，无疑是必要和有益的。为此，我社于2003年9月推出了由邵汉明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化研究二十年》一书，深受各界读者的重视和欢迎，出版不久，即告售罄。虽经修订再版，仍供不应求。

鉴于《中国文化研究二十年》出版后中国文化研究又有了诸多新进展和新成果，值此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之际，我社决定推出邵汉明主编的《中国文化研究三十年》，以飨广大读者。

《中国文化研究三十年》是在《中国文化研究二十年》的基础上，增补近十年来中国文化研究的最新成果，并对部分章节做了适当的调整和补充而成。全书分上、中、下三卷，上卷为中国文化学派研究，中卷为中国文化专题研究，下卷为主要著作和论文索引。

《中国文化研究三十年》具有“深沉的历史意识、强烈的现实感、巨大的信息量”的特征，既可供从事中国文化教学和研究的学者参考，又可供一般读者了解新时期中国文化研究整体情况之用。相信《中国文化研究三十年》的出版，能对中国文化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有所助益。

人民出版社

2009年8月10日

中国文化与文化中国

张岱年

中国素以文明礼仪之邦而著称于世。这“文明礼仪”意味中国有着独特的文化传统和丰富的文化内涵，在世界文明史和文化史上占有特别显著的地位。可是近代以来，中国落伍了，这落伍既有经济上的、政治上的原因，也有文化自身的原因，或者说，这落伍既是政治上的落伍、经济上的落伍，同时也是文化上的落伍。为了在落后、落伍的境地中重新崛起，中国人民经历了150年的长期而不懈的思索、追求和奋斗，而在21世纪初进入初步的小康社会。这是了不起的成就、了不起的进步。

然而，从初步的小康社会步入全面的小康社会，尚有相当的距离，尚需付出艰苦的努力。我们的目标，不仅要建设一个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大国、经济大国、军事大国，而且要建设一个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大国。21世纪的竞争不是某一方面的局部的竞争，而是综合国力的竞争。综合国力自然包括文化力——文化的活力、生命力、时代性和先进性。一个没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强大的文化竞争力的民族，很难说是一个有希望的民族。因此，我们要在加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建设的同时，大力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文化建设，发展和创新中国文化，实现“文化中国”的伟大理想。

发展和复兴中国文化，推进“文化中国”建设，有必要坚持以下几个原则：

一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不动摇，尤其要坚持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是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理论成果，马克思主义并未过时。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它也面临

一个发展和如何发展的问题。我们要用发展的观点和眼光来看待马克思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须要指出的是，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典范，是地道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我们要解决中国的问题，重要的是要坚持和发展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二是坚持以中国文化为主导、为基础。中国文化丰富多彩，中国思想博大精深，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概而言之，就是《周易》讲的两句话：“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中国文化精神具有超越时空的普遍价值和时代意义，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有识之士的重视和青睐，并对现代社会和现代生活继续发生着积极而深刻的影响。我们绝不能妄自菲薄，数典忘祖，而应视之为新文化建设的某种前提和基础，加以珍惜和弘扬。

三是坚持对现代西方思潮的批判和扬弃。现代西方思潮形形色色，就文化流派而言，有所谓进化学派、传播学派、社会学派、历史学派、功能学派、生态学派、结构学派、文化唯物论学派，等等；就人学流派而言，有以萨特为代表的存在主义，以马斯洛为代表的人格理论，以卢卡奇和葛兰西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以胡塞尔为代表的现象学，以杜威为代表的实用主义，以尼采和叔本华为代表的生命哲学，等等。与中国民族文化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相比，现代西方思潮总体上并不适合中国国情，但它们作为人类理论思维的精神成果，仍有它的意义和价值，有必要理性地加以审视，批判地加以吸收，既不能盲从和照搬，也不能简单地舍弃或视而不见，而要下力气去研究它、消化它。

四是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坚定“批判继承，综合创新”的立场。一个时代文化的繁荣取决于诸多方面的因素，但宽松的环境、争鸣的氛围显然是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因素。唯有“百家争鸣”，方可致“百花齐放”，春秋战国时期是如此，“五四”时期是如此，20 世纪的最后 20 年是如此，21 世纪中国文化的发展无疑也不能例外。因此，不同意见、观点的交流、交锋乃至碰撞、冲突在任何时候都是正常的，不必大惊小怪。同时，文化的发展乃是连续性和间断性的统一。所谓连续性，说的是人们只能在既定的历史条件下去创造新的历史、新的文化，而不可能抛开已有的历史和文化成果另起炉灶，从头开始；所谓间断性，说的是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学术文化，此一时代的学术文化所以不同于彼一时代的学术文化正在于

它有着自身特有的时代内涵。立足于文化的连续性，要求注重批判继承的工作，批判继承旨在肯定中的扬弃；立足于文化的间断性，要求注重综合创新的工作，综合创新旨在否定中的超越。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后者是前者的目标指向，二者相辅相成，构成文化发展的一条铁的定律。发展中国文化，推进“文化中国”建设，不能违背这一定律。

青年学者邵汉明同志长期研究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化，著有《儒道人生哲学》、《道家哲学智慧》（与张松如合著）、《中国哲学与养生》等，最近又主持完成《中国文化研究二十年》。对20世纪后半叶的最后20年中国文化研究和讨论的情况作出全面系统的梳理和总结，这确是一项极有意义的工作。汉明同志以洋洋洒洒70余万言的书稿见示，邀序于余。我因为年迈，不能细读，不过，仅浏览目录已可见出书稿内容之丰富，著者用力之勤勉。我衷心地希望该书的问世，能为新的世纪中国文化研究的深化和文化中国的建设起到某种铺垫或推波助澜的作用。

是为序。

2002年秋于北京大学



21 世纪与中国文化

郝 正

当代国人对中国文化的研究，当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初。那是一个时代精神大转折的时代。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深入，国人的注意力逐渐由政治运动转向现代化建设。追逐现代化的热情引发了传统与现代化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一时间，是固守传统，还是告别传统？抑或在传统与现代化之间寻求何种最佳的平衡点？这些问题掀起了一次又一次学术争论。20 年来，关于文化的讨论几乎未曾间断过。似乎所有的问题人们都反复不停地争论过；似乎所有的问题又一次次不得不重新开始，又把人们推入一次又一次的争论之中。这一切恰如美国诗人麦克利什所言：

我们已经有了，
所有的答案，
只有该提出什么问题，
我们却又不知道。

中国素以文明古国礼仪之邦著称于世，对文化问题一直有高度自信之传统。这种传统在近现代以来经历了三次大的论战。一是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随着西方工业文明冲击东方古老的农业文明，引发了中国人普遍的文化反省与文化批判，最终导致五四运动中激进的年轻一代告别传统，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道路。二是从新中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面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国情的矛盾，试图在告别传统的基础上，创造一种全新的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文化的努力。这种努力不幸最终陷入了乌托邦式的狂热。三是改革开放以来在追逐现代化的过程中，人们对传统与现代化、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矛盾关系的理性的和非理性的思考。其历程

就是 20 年来中国文化的 research 热潮。

我一直认为，文化研究是人的自我反思。文化是人的活动对象化的结果，是人的本质力量实现的自我证明。人类要进步，社会要发展，必须通过创造文化来实现。同时，文化作为对象化的力量，对人又是一种自我限定。人们只能在相对固定的文化支撑下来思考与创造。人类社会的每一次发展与飞跃，都只能在既依靠文化，又改造文化的过程中实现。所以人与文化的矛盾和冲突，是人的本质矛盾的深层体现；一个半世纪以来围绕中国文化的矛盾与冲突，就是中国人从传统农业社会走向现代化工业社会进程中灵魂再造的内心旅程。研究当代中国文化的意义，就在于揭示这一内心旅程的矛盾，寻找这一内心旅程的规律，预测中国文化未来的合理走向。《中国文化研究三十年》一书的作者，正是进行着这样的努力，以同样执著的精神在寻求一个半世纪以来，特别是近 20 年以来，中国人灵魂再造的内心旅程。

当代中国社会发展，正处在文化冲突的焦点。由于当代信息化、全球化和科学技术的原始策源地与优势占有者是西方文化，这就向面向 21 世纪的中国社会发展与文化发展提出了尖锐的挑战。挑战之一是在资本主义文化泛滥的背景下，如何能坚持社会主义的文化发展方向。挑战之二是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如何能继承并发扬中华民族的传统。挑战之三是在全球文化高度竞争、冲突的背景下，如何能追赶全球发展的潮流，缩小中国与世界的文化差距。

当代中国文化发展面临着两种矛盾的境遇。一是上述三种挑战以相互冲突的方式并存。不可否认，传统的文化模式存在的缺陷，是造成中国社会发展和文化发展与全球发展之间存在距离的原因之一。而为了争夺文化的主权，又必须发扬自身的特色，防止现代化、全球化演化成全盘西化。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需要与全球经济体系与技术体系、信息体系接轨。接轨的前提是提高中国文化与外来文化（包括西方文化）之间的协调性、融合性，甚至一致性，于是便会陷入文化趋同的陷阱，与文化的社会主义方向产生一定冲突。怎样做到既缩小文化差距，又能发扬光大自身特色与传统；既追赶全球化又防止文化趋同，这是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两难抉择。

二是中国文化自身发展的不平衡性亦以相互冲突的方式并存。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趋势之一是多重性的社会与文化跨越。中国社会发展区分为东、中、西三个发展阶梯，大体相当于信息社会、工业社会、农业社会三个大的

发展阶段。当代中国社会要在同一历史时期完成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从工业社会到信息社会的多重性跨越，自身内部就存在着不同文化模式和板块的矛盾。

当代中国文化发展面临的挑战和矛盾，向我们提出了深化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研究的重要使命。当代哲学研究的重心，应该适应当代社会人与文化矛盾的主题化，向文化研究转移。把文化哲学研究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要课题和重要组成部分。

文化哲学的核心课题，是建构文化理想，选择文化模式。文化理想是文化模式的核心和基本原则，确定了文化理想，也就确定了文化模式和走向。一种文化的特殊魅力，首先表现在其特有的文化理想之中。例如，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能够延续五千年而不断，其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天人合一的理想把每一个中国人都紧密地联结在社会网络内，形成了超强的凝聚力，强调天下一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个人理想和社会理想。

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奠定了当代中国革命战争时期的文化理想——“翻身求解放”、“建设新中国”和“为人民服务”。前者动员了亿万群众投身革命、拥护革命的政治热情；中者激励了革命者前仆后继的牺牲精神；后者培养出顶天立地的民族楷模。

当代中国社会正处于急剧的社会转型时期。这一时期人民群众存在一定的心理不适应。“旧的世界正在消亡，而新的世界尚未诞生”。现代人就这样徘徊在两个世界之间。发展的不平衡，转型期的社会紊乱，会导致许多人理想的崩溃和心理的惶惑。这是一个疑惑崇高又渴望崇高的年代。经济的躁动，迷信的横行，已经使一些人陷入了精神困境。哲学研究责无旁贷地要通过回应文化冲突的挑战，为当代中华民族的文化转型和创造而奋斗。

一种文化理想就是一个民族的民族精神。研究文化哲学也是对民族精神的追寻。一个在经济领域迅速腾飞的民族，也一定要在精神领域崛起。

2003年初春

一、文化大论争的出现不是偶然的

“文化热”肇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兴盛于80年代中、后期，进入90年代开始降温；“文化热”虽已降温，然文化研究和讨论却并未间断。自进入90年代以后，许多学人以冷静和理智的态度探究文化和文化史的种种问题，一段时间内又出现“国学热”。这是就外部表现而言中国当代文化思潮演变的基本脉络和基本轨迹。

“文化热”及“国学热”等现象的出现，不是偶然的。从历史的角度看，它是近代以来特别是五四文化论争的继续和发展。近代以前，由于清王朝推行闭关锁国政策，中国人不仅不知道外部世界发生的变化，反以“中央帝国”自居，夜郎自大。鸦片战争以后，迫于西方列强的武力侵扰，许多有识之士第一次感到，在国际舞台上，中华民族实际已经落伍了。因而提出向西方寻求真理，以图谋解救民族危机。一部中国近代史毋宁就是一部中国人不断地左冲右突、寻求强国富民、振兴中华之出路的历史。根据有关论者的考察，近代以来人们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从着眼于物质层面到着眼于制度层面，再到着眼于文化层面思考的递进过程。起初人们只感到物质或科技不如人，因而有所谓“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和洋务运动；进而人们又感到制度不如人，于是有戊戌维新和辛亥革命；直至五四，人们才又感到文化亦不如人，于是又有新文化运动的发生。然而，无论是物质层面的思考，还是制度层面、文化层面的思考，从根本上说，都是围绕中西文化的关系或传统文化和现代化的关系而展开的。近代的“中体西用论”，五四的“本位文化论”和“全盘西化论”，代表了从近代到五四人们对中西文化关系的基本认识和基本态度。应该说，80年代的“文化热”并没有背离从近代到五四文化论争的主题，它乃是这种文化论争的历史的延伸和历史的再现。

“文化热”及“国学热”的出现，还有其深层的社会根源，它是人们对

“文化大革命”进行理性反思的结果。有论者说，所谓“文化热”是同以往不重视文化研究相比较而言的。确实是这样，新中国成立几十年来，文化研究一直未受到应有的重视，一个十来亿人口的泱泱大国，文化学著作却少得可怜。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毋宁就是革文化的命，是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一场大劫难。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人们痛定思痛，开始意识到封建的遗毒远没有肃清，“文化大革命”表面上把反封建放在首要地位，实际上却是封建的非理性文化的一次大演习，什么“三忠于四无限”、“早请示晚汇报”、“一句顶一万句”等等，都是封建的东西，“左”的东西。因而有必要吸取“文化大革命”之教训，继承五四之精神，开展健康的文化争鸣，以完成反封建的艰巨任务。同时，许多人也开始意识到，反封建并不是不要传统，不要文化，传统文化之中既有消极的落后的层面，也存在大量积极的层面和有价值的因素，新文化的建构固然有赖于旧文化格局的打破，但更主要的还在于旧文化之积极层面的挖掘、吸纳和弘扬，割裂传统、抛弃传统是没有出路的。因而有必要对传统文化作深入细致的研究，区分良莠，以服务于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

必须指出，“文化热”及“国学热”等现象的发生，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向思想文化提出了客观的要求。进入新时期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的经济、政治发生深刻的变化，旧的经济模式、政治模式一步步被突破，新的经济模式、政治模式正逐步确立。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巨大变化要求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新文化或新的文化模式。基于现实社会发展的内在需要，“文化热”应运而生。同时，国门的再次打开，中外文化交流的加强，大大开阔了人们的视野，增进了人们对世界的了解，促使人们再一次思考中西文化的关系，思考怎样吸收西方先进文化以达到“洋为中用”的目的。西方文化的大量涌入，一方面给中国文化带来新的刺激和新的活力，另一方面它本身也是构成“文化热”的热源之一。

总之，正是上述诸种因素的交互影响和作用，导致古老的中国在新的历史转折时期，继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又一次奏出一曲文化大论争的宏伟乐章。

二、“文化热”的表现及特点

“文化热”及“国学热”等现象作为中国近20年中的一种客观的文化

存在，首先表现为全国各地先后举办了规模不一、数量众多的文化问题座谈会和研讨会，表现为许多高等院校和科研单位陆续成立了文化研究的专门机构和团体，表现为全国各社会科学院的院办刊物、一些高等院校的文科学报、一些文化研究机构创办的文化研究刊物纷纷开辟专栏，开展对文化和文化史各种问题的广泛讨论，表现为许多出版社先后推出《文化哲学丛书》、《人文丛书》、《人学丛书》、《中国文化史丛书》、《海外中国研究丛书》等各种文化和文化史丛书。

除了上述多方面的表现，近 20 年的文化研究还具有以下两个显著的特点，这就是广泛性和现实性。所谓广泛性，说的是参加这次文化论争的成员和文化论争所涉及的问题既多且广。从参加讨论的成员来看，不仅有大陆的专家、学者，还有众多的海外学子、港台及外籍华人；不仅有从事文学、历史、哲学等传统学科研究的人员，也有从事经济、法律、政治、社会、教育、心理等新兴学科和应用学科研究的人员；不仅有人文领域（包括文化、教育、艺术、新闻出版等）的同志，而且还有科学领域的同志；不仅有社会各界的名流、大家，而且对文化刚入门和未入门的青年学者、学生，乃至许多政治家、企业家等，都不同程度地参与到这次文化讨论中来了。相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主要局限于知识分子层面，这次文化讨论的阵营是大大地扩展了。尽管人们的认识千差万别，但所表现出的对“文化热”的普遍关注和对文化讨论的浓厚兴趣，却是一致的。另外，“文化热”所涉及的问题十分广泛。无疑，五四新文化运动所提出的中西文化异同问题，封建礼教的批判问题，民主、科学和理性精神的弘扬问题等，继续为人们所津津乐道，成为文化讨论的热点之一。但值得注意的是，人们已开始着手文化理论的学科建设，探讨诸如文化的定义和本质，文化的结构、模式和功能，文化的时代性和民族性的关系，文化的发展机制和文化研究的方法等重要理论问题。同时，人们还就人文文化与科技文化、部门文化与地域文化、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民族传统文化等诸多伴随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和文化讨论的深化所提出的新问题，作了初步的探索。总之，相对于五四运动，此次文化论争所涉及的问题是极大地拓展了。

所谓现实性，说的是“文化热”、“国学热”等绝非只是纯粹的学术论争，更主要的乃是基于现实社会发展的考虑。换句话说，文化讨论的出发点在于现实，其落脚点也在于现实。如前所述，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和现代化

建设实践是构成“文化热”、“国学热”等的根本原因。不仅如此，人们的文化论争大体上也主要是为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和现代化建设鸣锣开道的。这一点大致区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情况是，所讨论的问题直接源于现实，又直接服务于现实。如部门文化中的乡村文化、城镇文化、校园文化和企业文化等诸多方面的问题，正是这些领域在改革过程中提出的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不解决这些新课题，势必会影响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另一种情况是，所争论的问题与现实有十分密切的关系。如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关系，中西文化的关系，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民族文化的关系，五四精神等，既是学术问题，需要从学理上予以澄清；又是现实感很强的政治问题，需要立足于中国的历史和国情，立足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作出切实的说明。还有一种情况是，所争论的问题表面上看与现实并无直接的干系，然实际上却构成其他问题讨论的内在基础，并没有超越于现实之外。比如，关于文化史和文化理论有关问题的讨论即属此类。

三、文化研究和讨论的初步评价

如何评价和看待新时期出现的“文化热”、“国学热”等文化现象？有人说，“文化热”及“国学热”在总体上没有越出五四前后那场文化论争的范围，没有摆脱五四以来中西二元对峙的旧格局，因而它不过是“悲剧历史的喜剧重演”。也有人说，“文化热”、“只是赶时髦，刮一阵风，造一通声势”而已，在文化研究和建设上并无实质性的进展。笔者认为，这种看法很有些偏颇。

首先，将五四时期的文化论争归结为“历史的悲剧”，显然是一种哗众取宠的奇谈怪论，标新立异并不等于真知灼见，刻意贬损五四只能证明自己历史意识的缺乏而丝毫不损于五四的独特历史地位。其次，不能因为“文化热”、“国学热”与五四时期的文化论争存在某种类同之处，而彻底抹煞“文化热”、“国学热”在思想文化方面所取得的新进展；亦不能因为人们在文化讨论过程中曾经提出过一些片面性的意见，而从整体上否认“文化热”、“国学热”所取得的巨大成绩及其所产生的积极社会影响。

显而易见，凡是亲身经历了新时期文化思潮洗礼的同志，乃至站在汹涌

起伏的大潮之外的冷眼旁观者，只要不抱偏见，就不能不承认，“文化热”是中国现当代史上自五四之后又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改革开放近20年来，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发生了举世瞩目的变化，但最显著的变化无疑是人们的观念的变化；没有观念的变化，经济的变化、政治的变化都是不可能的。人们不会忘记，“文化大革命”时期，人们的观念是怎样一种僵化的状态，人们的精神面貌又是怎样一种悲惨的情形。可是今天不同，人们已不再为追求自我实现、个性张扬而感到不安，而是理直气壮地按照自己的意愿，在不违背公理的前提下干自己想干的一切；不再为讲究物质利益和精神享受而感到内疚，而是正大光明地去为之奔波、为之努力和奋斗；不再表现出对某些个人的盲目崇拜和对政治的狂热，而是越来越趋向于现实，趋向于按理性行事。总之，人们已开始打破旧的价值观念、旧的道德观念，抛弃旧的思维方式和旧的行为方式，逐步确立起新的价值观念，新的道德观念和新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而这一系列变化，应当说，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新时期的文化大争鸣。正是“文化热”，使中国人重新认识了世界，也重新认识了自己。如果说，五四运动带来了中国人的民族意识、国家意识的觉醒的话，那么，新时期的改革开放和“文化热”带来的则是中国人的自我意识和公民意识的觉醒（这是侧重而言，并不是一种全面的说法）。

近20年的文化论争除有其积极的社会影响和现实作用外，还有其不容低估的理论贡献。首先，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人们的文化讨论呈现出一种百家争鸣、畅所欲言的新气象，各种各样的观点相继提出。比如，在中西文化关系问题上，恪守本位文化论、中体西用论者有之，鼓吹全盘西化论、西体中用论者有之，主张综合创新论、批判继承论者有之，提倡有条件有选择地西化论、超越前进论者有之。在五四精神的认识上，既有传统的彻底反帝反封建说、民主科学说，又有富于时代感的救亡启蒙并行说、救亡即是启蒙说、救亡压倒启蒙说、思想启蒙中断说；既有全盘反传统说，又有有针对性地反传统说。在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上，一些人认为其间存在根本冲突，强调不破不立，力主抛弃传统；一些人接受海外新儒家的观点，认为传统是现代化的内在动力，强调致力于传统文化的现代转换；一些人认为二者既有矛盾冲突的方面，也有相通契合的方面，强调批判和扬弃传统；一些人认为，冲突与契合都不是绝对的，关键在于立足现实，寻找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结合点（或结合部），以实现中国文化的创造性再生。在其他热点问题

上，也普遍表现出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许多观点、意见、主张或囿于保守，或囿于偏激，或趋于平和。尽管如此，各种观点、主张的提出和论证，毕竟在客观上为进一步的探讨奠定了一个初步的基础。同时，经过较长时间的争鸣，纯粹保守或偏激的主张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批评和唾弃，这表明论者们已开始摆脱情感因素的干扰，运用理性思维以谋图古今、中西二元对峙的超越。

其次，有关具体问题的探讨取得较大的进展。在文化的基础理论研究上，虽然马克思、恩格斯曾经提出有关文化的许多重要原则和一系列具体思想，但其并未有意识地建构起一种独立的文化学理论体系。长期以来，我国文化界也没有把文化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来对待，理论研究极其薄弱。而在“文化热”中，人们已经意识到，有必要加强文化的基础理论研究，以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化学理论体系。有的论者着眼于现代西方各种文化流派著述的译介，以为文化理论探讨之资借；有的论者将新的方法论引入研究领域，开始就文化的本质、模式、要素、类型、功能和规律等诸多重要问题作初步的探讨；更为可喜的是，有的论者通过自己的研究，相继提出了实践文化论、唯物主义文化论等构想；还有的论者认为马克思主义虽是西方文化的产物，但它要在中国生根和发展，就必须吸收中国文化的精神养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之间有许多近似或相通之处，因而实现二者的联姻或结合，既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凡此探讨和努力，虽还只是刚刚起步，更艰苦的工作还在后头，但初创之功、开拓之绩实不可没。在企业文化的建设上，目前已实现从无到有的转变。以往我们是有企业无文化，除了单一的政治思想工作外，并无别的文化内容。随着企业改革的深化，企业文化建设终于被提上议事日程。一些关注中国企业发展的士或把眼光转向国外，直接吸纳和借鉴发达国家企业文化的成果，以为我用；或着手中国企业的历史和现状考察，开展企业的机制变革和转型、企业的经营和管理、企业内外环境的改善、企业人才素质的提高、企业的党政关系的处理、职工与企业关系的密切、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企业精神的树立、职工精神生活的充实等实际问题的研究，探索中国式企业文化建设的途径；或受日本、新加坡、韩国等国家利用中国传统文化经营管理现代企业的启发，认定传统文化与现代企业并非截然对立，反而可以为其服务，从而汲汲于传统文化中人文精神和思想管理的挖掘。凡此种种努力，无疑都是富有积极意义的工作。相

信不久的将来，中国的企业文化建设定会有较大的发展，并逐步形成自己的特色。在文化史和民俗文化研究等方面，成绩亦十分显著。自“文化热”兴起以来，中国文化史及其分支儒家文化、道家文化、佛教文化、道教文化等的研究，民俗文化中的饮食文化、节日文化、婚俗文化、风水文化、鬼神文化等研究，大文化中的茶文化、酒文化、建筑文化、豆腐文化等研究，一时异彩纷呈，呈现一派繁荣局面，使人目不暇接。这方面的讨论固然有待进一步深化，但现有的成果确已初具规模，让人欣喜和感奋。

再次，文化和文化研究的重要性得到社会各界人士尤其是文化界、学术界人士的普遍认同，这是“文化热”所产生的最突出的正效应。从不要文化到离不开文化，从不谈文化到大谈特谈文化，这毋宁就是乾坤倒转，有了这一转变，中国就有希望，人民就有希望。

不容否认，文化论争中亦曾先后表现出种种不良的倾向，文化研究亦还存在许多薄弱的环节。照笔者的考察，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一些方面。

一是将传统文化等同于儒家文化的倾向。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多成分多层次的有机复合体，其中儒家文化固然居于十分显要的地位，但不能因此而将中国文化归结为儒家文化。然而，在“文化热”的早期和中期，许多论者都几乎不约而同地将视野集中于儒家文化的论评，甚或直接以儒家文化来代替整个中国文化。这显然有违中国文化的客观实际。

二是全盘西化论倾向。全盘西化论并非“文化热”中个别论者的新发明，它乃是西方学者早已提出的强加于第三世界不发达国家的一种十分有害的文化主张。五四时期，胡适等人接受这一主张加以提倡有其特殊的时代背景。然而，在新时期的“文化热”中，这主张亦曾沉渣泛起，一些论者割裂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的联系，漠视文化发展的继承性、连续性规律，从民族文化虚无主义立场出发，强调彻头彻尾地抛弃中国固有文化，彻头彻尾地接受西方文化，个别论者甚至提出西化就是殖民地化。由于这一主张存在明显的理论漏洞和社会危害，因而很快受到绝大多数论者的严正批评和摒弃就是情理中事。

三是文化本位主义倾向。出于对全盘西化论倾向的批判和反动，亦由于受现代新儒学思潮的影响，在20世纪90年代的“国学热”中，一些论者不同程度地表现出文化保守主义或本位主义倾向，认定“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20世纪是西方文化统领人类的世纪，21世纪则是中国文化的世纪，中国文化具有超时空的价值，代表着新世纪世界文化发展的方向，必将